

《白虎通》选批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批判组

《白虎通》选批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批判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白虎通》选批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批判组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44,000字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44 定价：0·16元

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目 录

前言	(1)
一、批“天道不变”	(13)
【选批条目】	
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 有改造之文，无改造之质。（《三正》）	(13)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 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 也。……正朔三而改……三正之相承若顺连 环也。（《三正》）	(16)
五行之性，火热水寒，有温水，无寒火，何？ 明臣可以为君，君不可更为臣。（《五行》）	(20)
二、批“君权神授”	(24)
【选批条目】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 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尚书》）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爵》）	(24)
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夷狄威 率服故也。（《文质》）	(24)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 统理，调和阴阳。（《封禅》）	(27)
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	

- 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灾变》》 (28)
三、批“三纲五常” (32)

【选批条目】

- 三纲者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
《《三纲六纪》》 (32)
日行迟，月行疾，何？君舒臣劳也。
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 (34)
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凊淨》》 (34)
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三纲六纪》》 (36)
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夫尊子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故。《《爵》》 (39)
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
.....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情》》 (42)

- 四、批“上智下愚” (46)

【选批条目】

- 圣人者 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不
合序，鬼神合吉凶。《《圣人》》 (46)
圣人皆有异表。《《圣人》》 (48)

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
天所生也。（《圣人》） (50)

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礼不下庶人，欲
勉民使至于士。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
也。（《五刑》） (53)

五、批“礼乐教化” (58)

【选批条目】

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
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
礼所以防淫泆，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
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
乐》） (58)

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
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
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
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
也。（《五经》） (61)

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佐德助治，
顺天之度也。（《五刑》） (65)

前　　言

《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是东汉章帝于公元七十九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亲自召集并主持的一次以“讲议五经同异”为名的尊儒反法黑会的总结。这个黑会连续开了几个月，参加的反动儒生和官僚达数十人之多。会议的目的是要统一地主阶级内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使儒家思想典章制度化，以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会议讨论的结果，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决，并令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一书。

《白虎通》主要是用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和谶纬(“谶”音趁，是编造的一种预决吉凶的隐语或预言，“纬”是用宗教迷信来解释五经)来解释经学，把经学神学化。由于《白虎通》是皇帝钦定的典籍，因而含有“圣谕广训”的意思，具有封建宗法思想法典的性质，所以有人称它为“国宪”。《白虎通》至今流传下来的各代版本共二十几种。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麻醉、奴役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白虎通》一书的反动实质进行揭露和批判，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有助于我们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一)

白虎观会议的召开和《白虎通》一书的出笼，是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结果，是对两汉农民起义和法家对儒家的批判的一种反动，是西汉末期尊儒反法思潮的继续和发展，是封建地主阶级由进步革新走向反动保守的明显标志。

西汉从高祖到宣帝几代皇帝，由于地主阶级仍处于上升阶段，基本上都是实行法家路线的。但儒法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西汉统治者从尊法反儒公开转变为尊儒反法是从汉元帝开始的。在成帝、哀帝、平帝时期，董仲舒那一套神学化的经学实际上取得了正统地位。因为西汉后期，奴隶制度复辟的严重危险已经过去，封建制度已经逐步巩固，土地兼并更加激烈，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势力大为膨胀，地主阶级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西汉末年刘秀（东汉光武帝）窃取了农民斗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代表豪强大地主利益的东汉政权后，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向农民反攻：下诏释放被农民起义军俘虏后降为奴婢的地主和官吏；起用西汉的反动旧官吏和吸收大批豪强地主充实政府的官僚机构；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恢复和整顿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于是，朝廷中出现了外戚、宦官、豪门、官僚等政治集团，经济上出现了豪族的大庄园，他们对农民阶级进行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社会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汉王朝的统治者所面临的任务已不是进行什么社会变革，而是怎样加强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因此，封建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利用儒家复古的反动思想，维护并巩固它的统治地位。《白虎通》正是为了

这种政治需要而炮制出来的。它把谶纬迷信和儒家思想揉合在一起，使它更加系统化、神学化，并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永世不变的宗教信条，强迫人民遵从和信奉。因此，《白虎通》自始至终贯串着“神学目的论”的色彩，是有其政治上、社会上的根源的。

(二)

《白虎通》继承孔丘的天命论，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根据儒家“神道设教”的精神，用神学来解释五经，使经学神学化，从而论证和规定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白虎通》全书共有《天地》、《五行》、《三纲六纪》、《五经》、《嫁娶》、《丧服》等四十三篇，内容虽然相当庞杂，但是，它的总纲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

《白虎通》反复宣扬君权神授，它说天是神（“天之为言镇也”），君主是天的儿子（“天子者……为天之子也”），又是人民的父母（“天子作民父母”）。天授予君主统治人民的权力（“王者受命而起”），“天”还时刻关注君主的“治绩”，如果他“承天统理”，“天下太平”，天就降下“符瑞”以示嘉奖；如果他有了过错，就降下“灾异”以示警诫，要他“悔过、修德”。当时杰出法家人物王充揭穿了所谓“符瑞”、“灾异”都是儒家的捏造。他从天是自然的物质这一唯物论思想出发，论证天不是神，因而它既不能“赐福”，也不能“降祸”，他宣传的“天人相分”对于儒家的“天人感应”，特别是君主与上天相互感应这一愚弄人民的鬼话，是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孔丘曾说“唯天为大”，要“畏天命”。《白虎通》继承孔丘

的衣钵，对“天”的神化，就是为了对君主的神化。宣扬天上的神权，正是为了巩固地下的君权，妄图使封建统治永世不变。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上帝如果没有一个君主，永不会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不是“天”创造了统治人民的“君”，而是“君”制造了麻痹人民的“神”。林彪自吹是“天才”、“天马”，自比“周文”、“齐桓”，就是想表明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是“受命于天”的“人主”，“天才论”就是他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理论基础。林彪的“天才论”跟孔丘宣扬的“天命论”，《白虎通》宣扬的“天道”，三个“天”字，一条黑线，都是为了实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而求助于“天”，乞灵于“神”的。

在儒家的反动理论中，不但君权是神授的，君主统治人民的“道”也是“天”所规定的。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君主只能对制度作表面上的改变，至于“道”的本身，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什么是“无易道之实”呢？董仲舒说，三纲、五常、教化、习俗等都不能改变。《白虎通》不仅全盘照搬，还特别强调三纲中的主纲——君纲，是百代都不能改变的（“如君南面，臣北面……百王不易之道也”）。它又用五行中的“土”比作君主，说“土”居中央，是五行之首，借以表明君主至贵，君权至上。

孟轲首创的五行说历史观，经邹衍发展成“五德终始论”（各朝代都代表木、火、土、金、水五德之一，比如前朝是木德，本朝就是火德，以此类推，五德循环）。这种“五行更王”循环论的历史观，经过董仲舒的宣扬，大为流行。西汉

末年王莽逼孺子婴“禅位”时，就说，汉朝的火德销尽，应当以新朝的土德相代。西汉末年，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反动王朝。东汉统治者认为“五行更王”是一种危险思想，可以被利用来改朝换代、推翻刘家的天下，因此《白虎通》着重地对这一说教作了修补，它用五行说提出一个新的谬论：君是火，臣是水，有温水，无寒火，所以“臣可以为君，君不可更为臣”（《五行》）。妄想使刘家天下从此千秋万代永远不再被推翻了。

以五行迷信论证“君不可更为臣”，妄图维护刘家王朝万世一系，是《白虎通》的梦想，也是历代帝王的梦想。鲁迅曾说过，皇帝“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然而“家天下”至今仍然是反动派作不完的迷梦。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和独夫民贼蒋介石一样，教子读经，妄图建立林家世袭的封建法西斯王朝。正如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的，反动派“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

《白虎通》宣扬君权神授，就是要鼓吹封建统治的“天”不变，剥削压迫的“道”不变。就在白虎观会议后一百零五年，黄巾起义时响亮地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汉王朝也随之土崩瓦解。哪里有什么不变的天道？哪里有什么神授的君权？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真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真气，这几个月忽然大

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葬气了么？”这深刻揭露了宗教迷信的荒诞无稽，也是对儒家天道不变的说教切中要害的批判。

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针对董仲舒的谬论进行过批判：“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毛泽东：《矛盾论》）这就一针见血地把《白虎通》大肆宣扬的君权神授、天道不变的阶级属性揭露了出来。

《白虎通》在孔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正名”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纬书《含文嘉》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为了论证“三纲”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白虎通》用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教大量的加以比附，认为君、父、夫属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而臣、子、妻属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把“三纲”比作天、地、人，胡说“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就是说君象太阳，臣象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所以臣也必须围着君转；“父子法地，取象五行”，就是说父子象地上的五行，木生火，火生金那样代代相生，所以子必须从父；“夫妇法人，取象人合”，就是说阴阳相合，妇必须从夫。总之，牵强附会，东拉西扯，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论证“三纲”是“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白虎通》把“君为臣纲”放在首位。道理很明显，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君权”是地主政权的集中代表。可见“父纲”、“夫纲”都是围绕着“君纲”提出来的。《白虎通》胡

说：“妇人无爵”、“阴卑无外事”、“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故”，明确规定了妇女不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而且只能当男人的附庸。同时又竭力宣扬孔孟的“孝道”，父亲用孔孟之道来管教儿子，儿子应当乖乖地服从父亲的管教。（“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根据孔丘的说法，做到了对父“孝”，才能对君“忠”。这样，妇女要服从男人，男人又要做到“孝”，“孝，事君则忠”。可见“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直接为“君为臣纲”服务的。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白虎通》不仅极力宣扬“三纲”，而且还提出了“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这样就把封建宗法社会从父系（诸父、兄弟、族人）、母系（诸舅）、以及社会（师长、朋友）的各个角落，规定得更加严密、广泛，简直成了一个天罗地网。后世人把“六纪”叫做“六亲”。解放后，我们中国人民砸烂了“三纲六纪”的精神枷锁，对反动阶级实行了专政，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大肆攻击我们“六亲不认”。什么“六亲不认”？亲不亲，阶级分，他们攻击我们“六亲不认”，实际上就是妄图用封建宗法思想，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维护和调整“三纲”的关系，《白虎通》还大肆贩卖孔孟之道的伦理道德——“五常”（仁、义、礼、智、信），并把它加上神学的解释。把“五常”说成是“五性”，胡诌什么：“性者阳之施”，就是说“五常”是由阳气所生的，这样，“五常”就成了神所造的，是先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精神。《白虎通》

还说“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含五性”，所以“五常”是与生俱来的。很明显，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不仅如此，《白虎通》还把“五常”和人体的五脏比附在一起，胡说：“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就是说，人不仅生下来就已经怀有“五常”，而且人体的五脏也是根据“五常”安置的。这样一来，“五常”就变得更神秘了，也就成了神圣不能违背的道德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具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五常”这种封建道德当然也不例外。它不是什么超阶级、超社会的东西，它是根据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提出来的。比如“五常”中的“仁”，《白虎通》说成“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就是在重复孔丘“仁”是“爱人”的滥调。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提倡“仁”是“爱人”，是为了抹煞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麻痹农民阶级的斗争意志，防止农民反抗；在地主阶级内部，可以用来调和相互之间的争斗，以便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野心家林彪无耻地宣扬“五常”，胡说“仁”是“团结”，“智”是“唯物论”，其死党陈伯达更胡说“仁义礼智信，……很快被人民接受了。”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妄图用孔孟之道冒充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用心。

(三)

正如孔丘是反动儒家思想的开山祖师一样，《白虎通》则是反动封建宗法思想的第一部法典。

自白虎观会议之后，近两千年来，封建王朝更迭不知凡几，可是《白虎通》中那一整套儒家思想的典章制度却朝朝代代地沿袭下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大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状态的出现，如果我们要从思想方面追根寻源的话，《白虎通》就能提供极为明确的答案。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这是鲁迅说的。事实正是如此，而且越是社会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趋于激烈的时候，反动派越是加紧兜售《白虎通》这堆破烂。唐朝就把《白虎通》中大肆宣扬的“三纲五常”写进刑法条文，用来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规定了：凡是违反“三纲五常”的都称为“十恶”大罪，要受到严酷的处罚。到了宋朝，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农民起义的漫天烽火直接威胁着腐朽的封建制度。于是，可恶的大儒朱熹之流急忙跳出来，重复着《白虎通》的陈词滥调，胡说什么，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化身（“帝是理为主”），是不能反对的，老百姓必须服从他们的统治。而且他认为“理”就是三纲五常（“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纲常万年，磨灭不得”）。可见，他所指的“理”很明显就是《白虎通》所宣扬的“天道”的变种。宋朝统治者就是把这种“理学”，即反动的天道不变和三纲五常牢牢地焊接在国家

机器上，妄图借此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清朝，这种“理学”都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官方思想来统治人民。清朝大官僚、军机大臣张之洞就曾这样说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独夫民贼蒋介石一手举着血淋淋的屠刀，一手捧着孔孟之道的破烂，把经过白虎观会议钦定的经书称为“崇高的体系”，大肆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当他被中国人民打败滚到台湾以后，还挥舞着“三纲”、“六纪”的大棒，疯狂地反共反人民。刘少奇、林彪一伙大搞“克己复礼”，同样把孔孟之道奉若神明。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际上帝修反猖狂反华，刘少奇效法白虎观会议，在山东搞了一个“孔子讨论会”，掀起一股解放后罕见的尊孔妖风。一九六六年八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起，在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的第三天，林彪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叫嚷：“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寥寥数语，反革命用心昭然若揭。不难看出，他所要“罢黜”的，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独尊”的，正是孔孟之道。

但是，无论反动统治阶级如何挥舞着孔孟之道的黑旗，重复着《白虎通》中的黑话，都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正是历史的结论。